

# 中国城镇青少年成长的邻里效应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实证研究

孙伦轩

**摘要:** 居住区的特征会对青少年的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影响是否存在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还缺乏基于中国数据的检验和呈现。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3-2014)”的数据,发现不同类型社区影响城镇青少年成长的邻里效应:单位社区的集体社会化程度高于街坊型社区;商品房社区的社会控制水平高于街坊型社区;这些会导致青少年在自我教育期望和同伴上进程度上产生差异,进而影响认知能力的发展。这些研究发现揭示了青少年教育中的社区情境属性,对理解和推动转型期中国青少年的综合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青少年成长 邻里效应 社会控制 集体社会化

1987年,美国社会学家威尔逊(Wilson)在《真正的穷人》(The Truly Disadvantaged)一书中最早提出邻里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的概念(汪毅,2013)。他发现,在美国城市中存在着这样一些贫民区:失业率比较高,中产阶级纷纷迁移出去,老年贫困人口的比例增加,居民整体上趋于贫困化;贫民区的硬件条件限制着居民的选择和机会,整个居民区也形成了不同于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罗力群,2007)。在国内,人们也相继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移民女性的社会适应等领域发现了邻里效应的存在(戚迪明等,2016;金斗燮等,2014)。邻里效应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线索,即居住区的特征会对居民的生活态度、社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居住空间把居民同一定范围的社会成员、组织和服务设施联系起来,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机遇和日常互动,进而形成了社会不平等的重要维度(Sharkey,2013;Chetty et al.,2016)。作为成长过程中除家庭和学校外的重要场域,社区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不言而喻。优质社区不仅意味着更高质量的教育资源,也更为生活于其中的青少年提供更为积极良好的邻里示范;在这种社区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辍学率更低、学业成就更高(Wodtke et al.,2017;Owens,2010)。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经济的变迁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化,从而导致城市社区的分化与重组。单位住房的自由化改造和大批商品房的竣工使得城市居民有可能自由选择居住空间。而以学择居历来是中国人选择安身之所的传统。人们对投资学区房所带来的制度性资源(比如重点学校的入学机会)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不同社区的非制度性资源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不同社区的邻里效应可能影响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进而加剧青少年成长不公的宏观社会情境。然而,这些影响是否存在,其背后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对此还缺乏基于中国数据的检验和呈现。本研究从集体社会化、社会控制和社会资本三个理论层面梳理邻里效应对青少年成长的作用机制,并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CEPS)的数据对这些机制进行检验,旨在为政策制定者从社区角度对青少年的成长进行干预提供具体证据。

## 一、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伴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我国的社区类型处于不断分化的过程中,目前基本上形成

了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传统的街坊型社区;第二种类型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工业化时期的单位社区;第三种类型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商品房社区(李国庆,2007)。随着社区人员的流动和社区资本的不断分化,这三种社区呈现出梯度格局。对具有工作不稳定、自雇等特征的流动人员来说,他们更可能居住在条件恶劣、犯罪率高和环境差的地方(侯慧丽、李春华,2013)。

社区成员构成会对身心快速发展的青少年产生重要影响。国外研究表明,和生活于最好邻里环境的儿童相比,生活于最差邻里环境的儿童高中毕业的可能性显著降低;社区富裕居民的比例越高,学龄和学前儿童的认知能力就越高(Chaselsandale et al., 1999; Brooks-Gunn et al., 1993)。国内研究也表明,社区人均收入水平越高,社区内部的教育代际流动性就越强(于洪霞等,2016)。因此,我们可以假设,青少年所居住的社区类型会对其社会化过程产生重要影响。那么,邻里效应会通过哪些机制影响青少年的发展?从青少年社会化的角度来看,有三种理论视角值得关注。

第一种理论视角是集体社会化(collective socialization)。威尔森(1991)认为,在大多数居民具有稳定工作的社区中,社区成员在学习和工作过程中往往会形成积极向上的态度和行为,在这种社区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会更加珍惜教育机会,遵守学校规范,努力学习;而在成年人很少工作的那些社区中,因为缺少来自于成年人所建构的积极价值规范,青少年的生活更有可能杂乱无章。反制文化理论(oppositional culture theory)认为,消极的社区文化会侵蚀青少年获得更多学术成就的行为习惯(Fordham et al., 1986; Ogbu, 2004)。社会隔离理论(social isolation theory)也提出,如果生活于从社会网和正式制度中被隔离出来的社区,那么居住者就难以同主流文化发生联系。这种隔离也让身处其中的青少年滋生出反社会文化和越轨文化,进而对正式的学校教育产生抑制作用,从而影响青少年的成长(Massey et al., 1991)。

第二种理论视角是社会控制理论(social control theory)。同龄人会产生相互影响。如果社区存在更多青少年犯罪群体,那么非犯罪群体的青少年就有可能被拉入其中(Ellen et al., 1997)。如果居住区内有许多同龄人从事某种活动,那么青少年就会被社会化而从事那种活动(Small et al., 2001)。某些社区特征(比如贫困、高流动性等)会让居民在遭遇问题时更难发挥社会控制和产生社会连接。由于缺乏成年人的监控,同伴群体的影响甚至会超过父母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抵制包括学校规范在内等主流文化的反制亚文化极易滋生,青少年很容易习得反学校的态度和行为。因此,社区环境的差异会影响社会控制能力,进而影响居住于其中的青少年的成长。

第三种理论视角是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不同类型的社区给青少年的父母带来差异化的社会资本,从而作用于青少年的成长过程。在家庭教育中,一般存在两种社会资本。一是家庭内部社会资本,包括父母的态度、期望、育儿努力程度等;二是家庭外部社会资本(父母与同代成年人之间的信息交换),包括子女同学的父母、社区内的邻居等(赵延东、洪岩璧,2012)。邻里关系是重要的家庭外部社会资本。生活于优势社区的青少年更有可能接触有益的社会网络,从而获得更多有益于成长的资源、信息和机会。相反,生活于弱势社区的青少年的社会网络不但范围更小,而且质量更差。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与个体、团体与团体的关系就有可能是消极的。因为这种关系更可能是责任和负担,而不是优势互补或有效信息和资源的相互使用。李晓晗和郑磊(2016)的研究表明,父母可以通过孩子同学或朋友的父母来了解孩子的表现并规范其行为。因此,社区中父母之间以及父母与组织之间的结构与互动是影响子女成长的重要社会资本。

根据上述理论视角,我们使用几个变量进行操作化测量。集体社会化理论认为,不同氛围的社区会影响青少年对教育的价值判断,进而产生不同的学习态度,因而我们使用青少年对自己的教育期望对其进行测量。社会控制理论认为,生活于同一社区的同辈群体会带来差异化影响,因而我们使用青少年的同伴上进程度对其进行测量。社会资本理论认为,邻里关系是重要的家庭外部社会资本,是影响青少年成长的社会网络的有机构成,因而我们使用代际闭合对其进行测量(见表1)。

表 1 理论解释、渠道变量与操作化测量

理论解释	渠道变量	操作化测量
集体社会化	学习态度	教育期望
社会控制	同辈文化	同伴上进成度
社会资本	社会网络	代际闭合

中国城市社区类型的分化呈现出梯度现代化的格局,这可能与不同社区的居民阶层构成有关。街坊型社区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大量流动人口的主要居住社区,早期住户也大多是没有单位归属或在街道工厂就业的职工,职业杂且收入低。单位社区是具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特色的社区,居民主要是在国家单位和地方政府单位供职的员工,工作稳定且收入较高。单位社区拥有更为丰富的物质和文化资源,居住环境要远优于街坊型社区。单位社区与外界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单位作为一种地位的象征对居民的行为具有很强的制约力。商品房社区则是完全遵循市场而运作的社区,一般来说规模更大、配套更完备、居住环境也更为优越。

在城市化进程中,新的城市移民具备了自由选择居住空间的权力,但也仅在能力范围内搬迁到与其阶层相匹的社区中。这其中有因不同社区居住成本不同所导致,也有因不同类型社区在吸纳与融合流动人口中的包容度差异使然。具有工作不稳定、自雇等特征的流动人口更有可能选择居住在村委会社区而非居委会社区;没有本地户口的外来人口倾向于聚居在外来人口密度比较高的小区(侯慧丽、李春华 2013)。新的城市移民会进一步加剧不同社区的居民阶层差异。在外来人口聚集的社区,居住条件明显更差,居民对小区的评价更低,他们更少在小区内互动,对邻居的信任感也更低(陈钊等 2012)。集体社会化水平也越高,居民的社会网络越紧密,社区的社会控制水平也就越高。因而,综合这些研究发现,本研究提出几条研究假设。

假设 1: 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现代化水平越高的小区,青少年的教育期望越高;

假设 2: 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现代化水平越高的小区,青少年的同伴上进程度越高;

假设 3: 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现代化水平越高的小区,青少年获得家庭外部社会资本越多。

##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 (一) 数据与样本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初中阶段 2013 - 2014 学年的调查数据。CEPS 属于全国性调查数据,因而分析结果可以在国家层次上进行推论。CEPS(2013 - 2014)采用多阶段的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的抽样方法,以初中一年级(7 年级)和初中三年级(9 年级)两个同期群作为调查起点,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流动人口比例作为分层变量,在全国随机抽取了 28 个县级单位作为调查点。调查的执行以学校为基础,在入选的县级单位随机抽取了 112 所学校,438 个班级进行调查。被抽中的班级学生全体入样,基线调查了共约 2 万名学生。

我们将样本限定在家庭地区所在类型为城镇的初中生。在剔除变量上出现信息缺失的一些受访者后,最终共有 5639 个样本进入分析模型。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 (二) 变量设计

#### 1. 自变量

我国现有的社区类型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即街坊型社区、单位社区和商品房社区(李国庆, 2007)。本研究对社区类型的操作化测量使用 CEPS(2013 - 2014)家长问卷中的问题“您所在的社区类型是?”回答选项 1 表示“未经改造的老城区”(街坊型) 2 表示“单一或混合的单位社区” 3

表示“保障性住房社区” 4 表示“普通商品房小区” 5 表示“高级住宅区” 6 表示“城中村”(村改居或村居合并) 7 表示“农村” 8 表示“其他”。

保留回答为 1、2、4、5 的样本 将回答为 4 和 5 的样本合并为商品房社区样本。最终样本构成包括街坊型社区 (N = 750, 13.30%)、单位社区 (N = 979, 17.36%) 和商品房社区 (N = 3910, 69.34%) 这三种类型。

## 2. 因变量

第一个因变量是教育期望。CEPS 测量教育期望的问题为“你希望自己读到什么程度?” 回答选项依次为“现在就不要念了”“初中毕业”“中专/技校”“职业高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博士”。依据各教育阶段的受教育年限 对各选项进行赋值后生成教育期望变量。

第二个因变量是同伴上进成度。CEPS 询问了被调查学生好朋友的积极或消极行为。参照吴愈晓等(2016)等的做法 选取了三类积极行为(包括学习成绩优良、学习努力刻苦、想上大学)和三类消极行为(包括违反校纪被批评处分、经常上网吧或游戏厅、退学)。要求根据好朋友的实际情况 针对每一类行为 在“没有这样的”“一到二个这样的”“很多这样的”三个选项中选择一项。将三类积极行为加总 得到取值范围为 3-9 的“上进朋友”变量; 将三类消极行为加总 得到相同取值范围的“后进朋友”变量。将同伴上进程度操作化为上进朋友与后进朋友之比。

第三个因变量是代际闭合。CEPS 家长问卷中有以下问题“您认识与孩子常在一起的朋友的家长吗?” 回答选项分别为“不认识”“认识一部分”“全都认识”。

第四个因变量是认知能力。CEPS 为 7 年级和 9 年级学生分别设计了认知能力测试题。测试的具体内容并不涉及课程教授的具体记忆性知识 而是学生的逻辑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 因而具有国际可比性和全国标准化的特点。7 年级测试题共有 20 个问题 9 年级测试题共有 22 个问题。答题限时都为 15 分钟。测试题共分 3 个维度、11 个构念 包括语言(词组类比、语言文字推理)、图形(图形规律分析、折纸类题目等)、计算与逻辑(数学应用、自定义运算规则、抽象规律分析等)。原始分数经过三参数的 IRT 模型进行估测 得到的认知能力测试标准化总分作为因变量之一。<sup>①</sup>

## 3. 控制变量

包括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年级、年龄、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等。

### (三) 分析步骤

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不同类型的社区在集体社会化(教育期望)、社会控制水平(同伴上进程度)和社会资本(代际闭合)上是否存在差异。如果渠道变量因社区类型而异 则借鉴温忠麟等(2014)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以认知能力作为青少年的发展指标 继续使用嵌套模型 考察社区类型是否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变量而对青少年的发展产生影响。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Y = cX + \varepsilon_1 \quad (1)$$

$$M = aX + \varepsilon_2 \quad (2)$$

$$Y = c'X + bM + \varepsilon_3 \quad (3)$$

在上述公式中, Y 代表青少年的认知成就, X 为社区类型, M 为中介或渠道变量(教育期望、同伴上进程度和代际闭合)。方程(1)代表社区类型对认知能力的总影响; 方程(2)代表社区类型对中介变量的影响; 方程(3)代表社区类型通过中介变量对认知能力的影响。按照温忠麟等(2014)提出的检验步骤: 第一步 如果系数 c 显著 继续进行检验; 第二步 若系数 a、b 都显著 进行下一步检验 若有一个不显著 进行 Sobel 检验; 第三步 检验 c' 是否显著。

<sup>①</sup> 在检验了社区类型对三种渠道变量的影响后 我们将使用嵌套模型 以认知能力作为青少年的发展指标, 检测三种渠道变量是否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在结果的第一部分已呈现了方程 2 的结果, 后续部分因内容限制不再呈现, 从而导致上述步骤一出现在步骤二之后。有研究者认为, 第二步的中介效应检验不需要以第一步(  $c$  显著) 为前提, 因为中介效应的符号(  $ab$ ) 可能与直接效应(  $c'$ ) 相反, 从而使得总效益(  $c$ ) 不显著, 但中介效应依然存在( 温忠麟等 2014)。因此, 本研究的呈现步骤并没有根本性缺陷。

### 三、研究结果

#### (一) 中国城镇青少年成长的邻里效应

本部分考察不同类型的社区在集体社会化、社会资本以及社会控制水平上是否存在差异, 核心自变量是社区类型( 以街坊型社区为参照)。由于对代际闭合的测量所使用的是分类有序变量, 因而使用 Ologit 模型, 其余均使用 OLS 模型( 见表 2)。

控制变量的估计效应基本符合预期。例如, 男生与四种渠道变量都呈显著负相关; 独生子女与除代际闭合外的三种渠道变量都呈显著正相关; 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状况也基本上与渠道变量呈显著正相关。在核心自变量方面, 不同社区类型与青少年的教育期望和同伴上进程度显著相关, 但与代际闭合的关系并不显著。

生活于单位社区的青少年, 教育期望显著高于生活于街坊型社区的青少年(  $B = 0.313, p < 0.05$ ); 生活于商品房社区和街坊型社区的青少年在教育期望上无显著差异。因而假设 1 获得部分支持。生活于商品房社区的青少年, 其同伴上进程度显著高于生活于街坊型社区的青少年(  $B = 0.0862, p < 0.001$ ); 但生活于街坊型社区和单位社区的青少年在同伴上进程度上并无显著差异。因而假设 2 也获得部分支持。在代际闭合方面, 社区类型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因而假设 3 未能获得支持。

表 2 社区类型对渠道变量的影响差异

	模型 1( OLS) 教育期望	模型 2( OLS) 同伴上进程度	模型 3( Ologit) 代际闭合
社区类型 ( 参照: 街坊型社区)			
单位社区	.313*	.00423	-.0409
商品房社区	-.0559	.0862***	.0746
年级	-.433**	.0244	.197
性别	-.323***	-.241***	-.129*
是否独生子女	.220**	.0831***	.0495
年龄	-.191**	-.0682***	-.0907
家长受教育程度 ( 参照: 文盲及小学)			
初中	.361	.0818	.239
高中	.831***	.122**	.324
大学及以上	1.940***	.208***	.352*
家庭经济状况	.208*	.0506**	.268***
常数	18.77***	3.174***	3.485***
观测值( N)	5639	5639	5639
Adjusted R <sup>2</sup>	.0930	.0910	

注: \*\*\*  $p < 0.001$ ; \*\*  $p < 0.01$ ; \*  $p < 0.05$ 。下同。

## (二) 邻里效应的中介效应检验

社区类型对青少年的教育期望和同伴上进程度产生影响。那么,这种影响会对青少年的成长产生实质性作用吗?借鉴温忠麟等(2014)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本研究以青少年的认知能力作为被解释变量,使用嵌套模型检验邻里效应的中介效应。

模型4在考虑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只考虑社区类型的主效应;在模型4的基础上,模型5和模型6分别加入了教育期望和同伴上进程度(见表4)

模型4显示,社区类型对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具有显著影响。居住于商品房社区的青少年,其认知能力要显著高于居住于街坊型社区的青少年( $B=0.0949$ ,  $p<0.01$ );而居住于单位社区则与街坊型社区并无显著区别。模型5以教育期望为中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教育期望对青少年的认知能力的影响显著且积极( $B=0.0582$ ,  $p<0.001$ );在加入教育期望后,商品房社区的影响依然存在,即居住于商品房社区的青少年,其认知能力要显著高于居住于街坊型社区的青少年( $B=0.0981$ ,  $p<0.05$ )。这说明,教育期望在社区类型和青少年的认知能力之间发挥了不完全的中介作用。模型6以同伴上进程度为中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同伴上进程度也同样会对青少年的认知能力产生显著且积极的影响( $B=0.212$ ,  $p<0.001$ );在加入同伴上进程度后,商品房社区仍然存在显著且积极的影响( $B=0.0766$ ,  $p<0.01$ )。这说明,同伴上进程度在社区类型和青少年的认知能力之间发挥了不完全的中介作用。

表3 邻里效应的中介作用检验

	模型4(OLS) 主效应	模型5(OLS) 以教育期望为中介	模型6(OLS) 以同伴上进程为中介
社区类型 (参照:街坊型社区)			
单位社区	-.0628	-.0810	-.0637
商品房社区	.0949**	.0981**	.0766*
年级	.378***	.403***	.373***
性别	.00226	.0414	.0737***
是否独生子女	.154***	.141***	.136***
年龄	-.187***	-.176***	-.172***
家长受教育程度 (参照:文盲及小学)			
初中	.190**	.169**	.173**
高中	.270***	.222***	.245***
大学及以上	.431***	.318***	.387***
家庭经济状况	.0713**	.0592*	.0605**
中介变量		.0582***	.212***
常数	2.310***	1.216***	1.636***
观测值(N)	5639	5639	5639
Adjusted R <sup>2</sup>	.0740	.112	.0940

因而,以青少年的认知能力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由社区类型所衍生的“邻里效应”确实发挥了实质性影响。但相对于街坊型社区来说,这种影响主要还是发生在商品房社区。

##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中国城镇青少年成长的邻里效应,以及不同社区的非制度性资源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城镇青少年成长的邻里效应确实存在。居住于不同类型的社区给青少年的成长带来显著影响。这也同新近的一些研究发现较为一致(刘欣等 2018; 余丽甜等 2018)。因而,对“以学择居”现象的考察不仅要关注代表物质性资源的“学区”,更要考察代表非物质性资源的“择邻”行为。邻里效应所致的居住情境不公应该成为考察青少年成长差异的重要维度。

我们进一步探讨了邻里效应产生影响的三种机制。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社区的集体社会化和控制水平之间存在着差异;单位社区的集体社会化程度要高于街坊型社区;商品房社区的控制水平要高于街坊型社区;这些差异进而会对不同类型社区的青少年发展产生影响。单位社区的集体社会化程度较高,这可能是源于其居民主要是在国家单位和地方政府单位供职的体制内精英。他们收入较高且流动性非常低,这就使得他们更有可能持续和长久地为社区内的青少年提供积极可信的行为示范。此外,接受良好教育是体制内精英实现社经地位代际传递的最主要途径。在这种社区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会更加珍惜教育机会,教育期望相对较高。而商品房社区更多居住的是体制外精英,他们流动性较高。对他们来说,教育并不是实现家庭地位代际传统的唯一或最主要的途径。因此,居住于商品房社区的青少年的教育期望并没有显著高于其他社区。

但是,商品房社区的富裕程度要远高于其他社区,居民遇到问题时更容易产生社会连接。因此,成长于这种社区的青少年会更为上进,更少习得反学校的态度和行为。与此同时,居住于不同社区的青少年其家庭外部资本存在差异的假设并未获得实证数据的支持。这可能同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所带来的邻里氛围有关。一方面,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外来人口涌入社区,农村传统守旧的文化和城市居民的现代意识发生碰撞,造成两类人群的分化和分割。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强调竞争,人们的个性化和原子化意识愈加强烈,他们开始更倾向于在私人领域中寻找生活意义,关注的焦点开始转向家庭内部的小天地,社会和邻里仅仅是一种外在环境而已。

这些研究发现启发我们,以社区为中心的居住群分现象其实反映了社区之间邻里和资源的差异。这些差异会导致青少年成长的环境不公,需要引起各方关注。对政策制定者而言,一方面可以考虑向贫困家庭提供住房补贴,鼓励它们向条件较好的社区搬迁。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针对贫困社区开展一系列“社区复兴项目”(比如,改善邻里环境、加强儿童教育以及减少青少年犯罪等),从而使居民不会因为自己所处的邻里环境而遭受到排斥和不平等。对教育工作者来说,要充分理解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这种社区情境属性,在课堂教学中对居住于贫困社区的青少年给予更多关注;在课堂外也要给予他们更多心理支持,以缓冲和消解“邻里效应”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本研究对中国青少年成长的邻里效应进行了初步探索。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本研究在数据的使用和方法的选择上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数据是广泛使用的全国基线调查数据,但其对邻里效应的测量并不深入,也不成系统。我们只使用社区类型进行测量还稍显粗糙。期望未来研究能采用更为客观的操作化指标,从而提供更为科学和客观的研究证据。其次,“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是截面数据,对内生性和异质性问题的控制是一个难题。为了更好揭示邻里效应与青少年成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需要使用动态追踪的调查数据以及自然实验等方法。最后,应该关注不同群体所接受的邻里效应的异质性。例如,有研究发现,居住于弱势社区对青春期学生的影响最为剧烈,而且家庭的贫困程度会强化这种消极影响(Wodtke et al., 2016)。然而,这些异质性还未得到基于中国数据和情境的检验和呈现。这应该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 参考文献:

- 陈钊、陆铭、陈静敏 2012,《户籍与居住区分割:城市公共管理的新挑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侯慧丽、李春华 2013,《梯度城市化:不同社区类型下的流动人口居住模式和住房状况》,《人口研究》第2期。

- 金斗燮、杨洋 2014,《居住地区民族构成对婚姻移民女性社会活动和适应类型产生的影响: 邻里效应的检验》,《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李国庆 2007,《社区类型与邻里关系特质——以北京为例》,《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2期。
- 李晓晗、郑磊 2016,《社会资本起作用吗?——农村家庭的代际闭合与儿童学业表现》,《教育学报》第3期。
- 刘欣、夏彧 2018,《中国城镇社区的邻里效应与少儿学业成就》,《青年研究》第3期。
- 罗力群 2007,《对美欧学者关于邻里效应研究的述评》,《社会》第4期。
- 戚迪明、江金启、张广胜 2016,《农民工城市居住选择影响其城市融入吗?——以邻里效应作为中介变量的实证考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第4期。
- 汪毅 2013,《欧美邻里效应的作用机制及政策响应》,《城市问题》第5期。
- 温忠麟、叶宝娟 2014,《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心理科学进展》第5期。
- 吴愈晓、黄超 2016,《基础教育中的学校阶层分割与学生教育期望》,《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于洪霞、张森、赵树贤 2016,《社区环境与教育代际流动的多水平分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1期。
- 余丽甜、詹宇波 2018,《家庭教育支出存在邻里效应吗》,《财经研究》第8期。
- 赵延东、洪岩璧 2012,《社会资本与教育获得——网络资源与社会闭合的视角》,《社会学研究》第5期。
- Brooksgunn, Jeanne et al. 1993, "Do Neighborhoods Influence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9(2).
- Chaselansdale, P. Lindsay et al. 1999, "Young African American Multigenerational Families in Poverty: The Contexts, Exchanges, and Processes of their Lives." *Gunn*.
- Chetty, R. et al. 2016, "The Effects of Exposure to Better Neighborhoods on Children: New Evidence from the Moving to Opportunity Experi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4).
- Fordham, S. et al. ,1986, "Black Students' School Success: Coping with the 'Burden of Acting White'." *Urban Review* 18(3).
- Ingrid, Gould Ellen et al. ,1997, "Does Neighborhood Matter? Assessing Recent Evidence." *Housing Policy Debate* 8(4).
- Massey, D. S. et al. 1991, "Segregation, the Concentration of Poverty, and the Life Chances of Individual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4).
- Ogbu, J. U. 2004,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the Burden of 'Acting White' in Black History, Community, and Education." *Urban Review* 36(1).
- Owens, A. 2010, "Neighborhoods and Schools as Competing and Reinforcing Contexts fo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3(4).
- Sharkey, P. 2013, *Stuck in Place: Urban Neighborhoods and the End of Progress toward Racial Equ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mall, M. L. et al. 2001, "Urban Poverty after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Rediscovery of the Family, the Neighborhood, and Cultur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7(1).
- Wilson, W. J. 1991, "Studying Inner-city Social Dislocations: The Challenge of Public Agenda Research: 1990 Presidential addre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1).
- Wodtke, G. T. & M. Parbst 2017 "Neighborhoods, School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A Formal Mediation Analysis of Contextual Effects on Reading and Mathematics Abilities." *Demography* 54(5).
- Wodtke, G. T., D. J. Harding & F. Elwert 2016, "Neighborhood Effect Heterogeneity by Family Income and Developmental Perio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1(4).

作者单位: 天津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责任编辑: 王 兵



students'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ocial capital , etc.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Differences in Mental Health Depression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 **The Neighborhood Effect of Adolescent Development in Chinese Cities and Towns**

..... *Sun Lunxuan*( 31)

**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sidential areas could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s on adolescents' life attitude and social behavior. However , regarding whether these influences exist and their functioning mechanisms behind , there still lack examination and presentation from Chinese data. Based on the data from "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2013 – 2014) " , this study has found the neighborhood effe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mmunity on adolescent development: the unit community has higher level of collective socialization than neighborhood community; the commercial residential community has higher level of social control than neighborhood community. These could lead to the differences in self-educational expectation and peers' progress level among adolescents , and consequently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ability. These findings reveal the attribute of community situation in adolescent education. They have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realistic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and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dolescents in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

**Keywords:** Adolescent Development Neighborhood Effect Social Control Collective Socialization

### **The Impacts of Migrating Parents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the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 *Xu Qi*( 39)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related studies at home and abroad , this paper suggests six mechanisms for impacts of migrating parents on children's academic performance. Combining with traditional gender division of "the man goes out to work while the woman looks after the house" , this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se six mechanisms. Through deep analysis of baseline survey data from "China Education Panel Study( 2013 – 2014) " , we find that only mother's migration alone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influence on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s academic performance. It is mainly because that mother play more important role in childrearing than father in rural family. If father and mother migrate simultaneously , the children also suffer from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mother's migration , but the timely participation from grandparents could partly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mother's rearing role. In conclusion , we should strengthen father's responsibility in child rearing and improve the balance of family education in both genders. This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 for promoting the quality of child rearing in rural family. In addition , if the parents are out for work , we should affirm the grandparents' caring function for their grandchildren.

**Keywords:** Left-behind Children Academic Performance Influencing Mechanism Gender Differences Cross-generational Rearing

### **The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Folk Beliefs in Marriage Convenience**

..... *Que Xiangcai & Lu Shaomei* ( 52)

**Abstract:** Using the survey data collected in rural areas of Fujian and drawing support from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folk beliefs in rite of marriage in rural areas. The examination is conducted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 namely the belief knowledge , the belief faith and ritual particip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 there exists the effect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folk beliefs in marriage convenience; the parents' folk beliefs in marriage convenience could positively influence their children significantly. Regarding the belief knowledge and belief faith in marriage convenience , they are more influenced by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 children's attitude of mate selection and occupation. Comparing with them ,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effect of ritual participation is more significant. The children's educational level ha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